青未了
随笔
齐鲁晚报
星期三 2015.1.14
A21-A24
思想光华 文字魅力

【名家背影】

# 送庞朴先生远行

□吕家乡

2015年1月9日，国际著名哲学家、中国著名哲学史专家、儒学研究泰斗、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庞朴先生在济南去世，享年87岁。

山东师范大学吕家乡先生撰文回忆庞朴先生：按照他的哲学家胸襟，他大概早有庄子“等生死”的感悟。在我这个俗人的心目中，他的学术遗产和精神风范将长留人间。

听到庞朴先生(1928-2015)去世的噩耗，我和庞朴几十年交往中的片断印象又在眼前浮现。

1951年3月，华东大学和青岛的山东大学合并。原来的山大校刊《山大生活》改名为《新山大》，增加了几位专职编辑，都是来自华大的年轻干部，其中就有庞朴。我们原来在《山大生活》的编辑都是兼职的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经过一段过渡、交接，我们原来的兼职编辑就撤出了。我和庞朴就是在交接过程中结识的。撤出后，我仍然是校刊的积极投稿者，有时校刊也向我约稿。有一次庞朴约我写了一篇关于“五四”青年节活动的报道，因为提到余修同志调动的消息，不合新闻纪律要求，没有刊出，庞朴特地向我作了解释。后来我投过一篇《什么是英雄》的杂感，也没有刊出，庞朴也特地向我做了说明。我毕业后，到济南工作，仍不断收到寄赠的校刊，先是庞朴给我寄，后来是葛懋春给我寄，一直延续到1955年“反胡风”运动。这期间我曾向校刊投稿数次，都很快就发表了，有一篇《向母校，叙别情》还得到《文汇报》转载。

大约1956年，我在一个大杂志(可能是《新建设》)上看到庞朴发表的哲学论文，是专门阐述“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这个规律曾经被斯大林废除过)。我才知道庞朴已经是很有锐气的哲学界新秀了。1957年春，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接着是反“右派”，听说庞朴当时在北京进修，写了大字报寄给山大。因为邮寄耽误了几天，他的大字报张贴出来时已经没有轰动效果。当时庞朴颇觉遗憾。但也正因为没有轰动效果，后来没有给他戴“右派”帽子，只是开除团籍。

“文化大革命”风暴掀起，我以“右派翻天”的罪名成了群众专政对象，管制时紧时松。1967年初，我在学校园地“监督劳动”，一天中午我在学校食堂吃了饭，回到宿舍休息，想不到葛懋春、庞朴敲门进来了。风声鹤唳之中，他们怎么来找我这个批斗对象呢？原来庞朴和葛懋春曾经以“鲁春龙”的笔名合作发表了一些文章，还曾在山大参与主持“思想史讨论班”。“文革”开始后，“思想史讨论班”被说成“三家村”式的反党黑店，“鲁春龙”的文章也被说成反党黑文，他俩都受到冲击。这一天他们来找我，是要把一些“黑材料”藏在我这里。我那时已经被抄家数次，估计再被抄家的可能性不大，我就接受下来，藏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我说：“你们要我保存的是什么材料，我不管，也不看。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只要我不出大事，保证完璧归赵。”他们还没吃午饭，我就到学校食堂买饭，可是早已误了饭时，只买来几个馒头，还提来一饭盒菜汤。庞朴搅动了一下菜汤，说：你们学校的食堂也造反了吗？葛懋春对我说：你去买点小菜吧！我说：现在楼下小铺也没有什么小菜。其实不是买不到，而是因为我已经被扣发工资，一文不名了。可是我看他们也在患难中，怎么好意思诉苦呢？他俩每人吃了一个冷馒头，就匆匆告别了。几个月后，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示发表，葛懋春因为曾经支持过“两个小人物”，得以解放，从我这里完整地取走了“黑材料”。

1978年秋，山大举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研讨会，庞朴(那时已在北京工作)也来了。有一天我去旁听，休息时我和葛懋春说起“文革”初期藏“黑材料”时让他们吃菜汤的事来，葛懋春这才知道我那时已经被扣发工资。他说：“我当时还没有扣工资，你怎么不跟我要钱呢？”我说：“我知道你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找到我，在那种情况下，我怎么会张口向你要钱呢？”我给庞朴写了一首打油诗请葛懋春转交，现在只记得最后两句是“多少亲友生罅隙，烈火熊熊烧秃头”。后来收到庞朴从北京寄来的一首赠诗：“曾借玉楼作箭楼，为攻为守细躇踌。图书四壁无君影，号角一声增客愁。惯见红兵呵臭九，不期青眼待亡囚。古来谢饭多佳话，嗟我庸庸空白头。”诗后附言说：“一九六七年亡命家香处，相濡以沫。今秋重返济南，得家香赠诗。谨次原韵，以谢盛德，兼志历程。庞朴一九七八年于蓟门。”(**编者注：诗后附言中“家香”为本文作者曾用名。**)

大约十年前，我校(山东师大)的齐鲁文化研究中心邀请一些著名专家来参加“论坛”，庞朴也应邀前来。我听了他的一个讲座。一开始主持人介绍说“庞朴先生是国学研究的大师”，他郑重声明自己不是大师，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面前，只是个勤奋的小学生。虽然听讲者只有寥寥十来个人，他却讲得很认真，而且始终精神饱满，有时还在黑板上写写画画。散会后，我随他走到宾馆，聊了一个来小时。我送他一本散文集，题词是：“泉城正待好风景，布谷声里又逢君。”他笑了笑说：“我能算什么风景？”我说：“你不愧是名副其实的大‘家’呀。老祖宗有五行说，毛泽东有两分法，你提出三分法，了不起呀！”“哈，姑妄言之罢了。”我说：“听说你成了联合国的什么官员了，国际影响够大的了！”“嗨，无非是个名义，亦真亦幻，若有若无。”停了停，又说：“许多事都是这样，正像《红楼梦》所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哲学。至于平日做人做事还是要一板一眼，货真价实。”我笑着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可以这样理解吧？”我的散文集里有一篇文章是怀念葛懋春的，他看了标题，叹口气说：“老葛的心胸够开阔的了，可是晚年还是有些郁闷的事。人就是人，不如意事常八九，想不开不行，完全超脱也不大可能……”

四年前，庞朴成了母校山东大学的终身教授。我看到这个消息，曾想打个电话祝贺，接着想到他那年所说的“无非是个名义，若有若无”，就没有打。不过我知道他担任终身教授绝不是尸位素餐的空头“名义”，而是非常认真和投入的，“一板一眼，货真价实”。早在2004年，他就受邀加盟山东大学，在儒学研究中心的建立和发展上，在一系列重大学术成果的编纂、出版上，都渗透着他的心血。

庞朴先生走了。按照他的哲学家胸襟，他大概早有庄子“等生死”的感悟。在我这个俗人的心目中，他的学术遗产和精神风范将长留人间。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窥海斋】

# 曾昭科：我的曾经的系主任

□林少华

元旦前的一天，广州朋友一大早就发来一则消息：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暨南大学教授曾昭科同志逝世，享年91岁。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曾昭科同志的逝世表示悼念。

我的心陡然沉了下来，久久凝视曾昭科先生的遗像。专注、坚毅而友善的眼神，微微向左侧翘起的嘴角，孤峰般拔地而起的鼻梁，花白而并未稀疏的头发，深色的玳瑁框眼镜……一如往日，一如往日！

对于我，较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昭科先生更是我的系主任，一位提携和帮助过我的可敬的长者。

山东、广东，黄海岸边、南海之滨，青岛、广州——我的情思缓缓跨过辽远的时空，此刻正萦绕着33年前的暨南大学校园，那座“旧貌换新颜”之前的古朴凝重而又轻盈舒展的老暨南园。

时间回流到33年前的1982年。那年初秋，我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南下，来到暨南大学外语系任教。坦率地说，暨大并非我的首选，首选是中山大学。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暨大还没有日语专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革”祸止，国家趋治，改革开放，百废待兴，世道人心远没有今天这般错综复杂。我和多数身穿“地摊货”而志在云天的年轻硕士们一样，摩拳擦掌，一心想在专业上一显身手。没有对口专业的大学自然让人避而远之。但当时是分配制，虽几次找研究生处诉说，但最后一纸报到通知书下来，仍分明写的是“暨南大学”。于是我坐长达四十八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差不多从中国的最北端来到差不多算是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广州，走进市郊这座历史悠久而复办才四年的华侨高等学府。曾昭科先生当时正是那里的英语教授兼外语系主任。回想起来，当时的暨南园真是别有天地。高大的棕榈树迎风摇曳，灿烂的紫荆花如霞似锦。湖光潋滟，曲径通幽。学校董事长为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校长为时任广东省长梁灵光。我所在的外语系副主任是当时就已知名的翻译家和诗人翁显良教授。教日语的同事中有翻译风行全国的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血疑》的禹昌夏先生。一次在校园路上偶然遇上从我的母校吉林大学调来的著名实验物理学家黄振邦教授……而他们全都那么和颜悦色，平易近人，任何时候想起都会让人心中平添暖意，感觉就像躺在春日阳光下的山坡眼望满树杏花。

我就在那样的环境中见到了曾昭科先生。第一次见他应该是全系开会的时候。一切历历如昨。高悬由叶剑英元帅题写的“暨南大学”四个大字的正门进去不远即是教学大楼。那是香港实业家王宽诚先生捐建的五十年代风格建筑，平面呈“工”字形，正面立体呈“品”字形(现已不存)。全系在左端三楼朝北一间教室开会。大家坐在桌椅兼用的拐肘木椅上，年近花甲的曾昭科先生站起来讲话。他身材高大，魁梧健壮，举手投足透出一股英风豪气。嗓音时而沙哑低沉时而又高亢洪亮，如长风出谷，四野盘桓。我很意外，眼前的他根本不像广东人，完全一副关东出身的将军气度。

▲曾昭科1962年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活动。

更让我意外的是，将军气度的他，办起事来却不动声色。一次我向他讲了自己的专业梦，他听了并未多说什么。但时过不久，他忽然告诉我：教育部和国务院侨办批文下来了，同意开办日语专业，明年招生，你当教研室主任。记得有一天我在系资料室一张长条桌旁闷头翻阅杂志，他拖一把有些瘸腿的木椅坐过来说：“小林，你看办日语专业需要哪些原版书刊，你开个名单我求香港开书局的朋友从日本买来。朋友年纪大了，有可能是帮我们最后一次了……”写到这里，眼前清楚地浮现出先生不无伤感的热切的眼神，耳畔响起先生特有的语声和热乎乎的气息。他的确、的的确确是个极有存在感、有“质感”的人。因了他，环绕他的那间光线阴暗、气氛抑郁的资料室大房间里的一切也似乎有了质感，有了生动的表情。

尤其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他通过系总支书记鼓励我申报副教授职称。于是，任教不过三年的我，顺利跳过“讲师”而在1985年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还有，先生把我的家人悄悄调进了暨南大学。本来是作为资料员调进的，但很快转为教员上台讲课。你说，一个年轻教师最在意的是什么呢？无非专业对口、职称和家庭这三样，而曾昭科先生都在不动声色之间为我解决了。而且，除了专业外都没用我主动开口，办的过程甚至最后办成了也没亲自告诉我，见面也没提起，就像没那回事一样。人生难有知遇。应该说，那是我工作极卖力气的几年。他被增选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以后，就更忙了。加之他后来不再兼任外语系主任，连见面都不容易了。1999年我北上青岛，尔来十五年间，再未相见。

现在媒体上关于曾昭科先生的“传奇”，我那时就已听同事说了(从未听他本人提及)。最“传奇”的是，由于他从香港及时向大陆通风报信，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的飞机才免于失事……

容我概括一下曾昭科先生的简历。先生1923年6月18日生于广州，在广州读完小学后入读香港九龙华仁英文书院。后赴日留学于早稻田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1947年毕业回港，出任九龙刑事侦缉处副处长等要职。1960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进修高级行政课程，回港后升任助理警司、警察训练学校副校长。1961年“红色特工”事发后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定居广州。1962年作为特邀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先后在广州外国语学院、暨南大学任英语系教授、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1984年至2001年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历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先生一生波澜壮阔，跌宕起伏，阅人历事，无可胜数。我想先生大概不会记起自己无私关照过的我这个晚辈，但我会永远记住他，记住他提携后学的仁厚长者之风，记住他不顾个人安危的伟大的爱国情怀和高洁的民族操守，记住他非凡的使命感和历史功绩。黄海夜雪，灯火迷离，天地空茫，音容宛在。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先生千古！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编辑：孔昕
设计：壹纸工作室　牛长婧